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三十六期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

编者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新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一部观念史。依据观念的乌托邦，一个芜杂的旧社会被简化为只有党、军、群的新社会。在抽象的层面，这三者利益高度一致且都带着耀眼的光环，神圣不可侵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军队、“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的保护下当家作主。在实际的层面，党、军队和人民群众都是有组织的实体，全社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但到了文革时期，原先毋庸置疑的观念突然发生了混乱甚至颠倒：党出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军队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人民群众出了“反动组织”……结果也弄颠倒了：人民群众在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号召下向领导人民的党夺权……由此，为这些颠三倒四的观念折腾得晕头转向的内蒙军民终于不惜抗命，大打出手……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一切都不可理喻。他是创造观念的高手，颠覆观念的大师。诸如土豪劣绅、开明绅士；民族资本、反动资本；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团结斗争、民主专政、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干部走资、造反保皇、左派右派……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打哪指哪，随心所欲。他掌握着观念的最终解释权，因为现实体制公认他是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党、军队、人民群众皆为麾下。

即便如此，文革时如日中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一再叹息：“英雄运去不自由

”。其实，这个“运”，就是历史规律。从本文所述可见，乱局一旦形成，始作俑者决难收发自如，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员们费尽口舌也说不清那些他们自己也未必理解的概念，发难者个个“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群起而哄之，事态的平息还得靠组织措施——也不过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为下一轮纷乱埋下隐患。

从长远看，文革的彻底失败和被彻底否定，也是“运去”的结果。整个民族固然承受了深重的苦难，那些曾经神圣的观念也光环不复当年。神话一经证伪，就变成鬼话、笑话。

内蒙古的夺权风波

吴迪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夺了市委的权，毛泽东称赞：“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9日和16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向全国造反派发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内蒙古，造反派闻风而动。

军队卷入报社夺权

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的大权被夺。夺权的是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与“呼三司”（呼和浩特大中专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8·18”（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八一八”革命造反团）、“党委红旗”（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总部）声气相通。他们计划于23日出版第一号新《内蒙古日报》。

1月22日（新报问世的前一天）下午四时五十分，二十余辆大卡车、大轿车停在报社门前。千余名“红卫军”（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联合会）、“工农兵”（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在报社内的保守派的接应下，涌进报社。一群人冲进轮转车间，拆下轮转机的大牙轮，撕碎机架上的卷纸筒，砸坏铅版、油嘴，烧毁变压器，刚刚印出的新报被踩到脚下。另一群人冲进汉文车间，撕破门帘、推翻字架、砸坏桌椅、撬開箱柜、抢走铅字。播音室和夜班室同时遭劫，生产线上的工人与下厂劳动的学生被打，三名十五中的女生被撞倒，来人从她们身上踩过。……

全市造反派闻讯赶来，工学院“井冈山”一马当先，报社内外一下子又多了几千人。

造反派围住保守派，舌战、打人、砸车，文武双全。保守派寡不敌众，纷纷逃遁。造反派扣下汽车、抓住“铁杆”、驱散余众，重新夺回了报社的权。

子夜，正当造反派庆贺胜利之际，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急驰而来，带队的是内蒙军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军队一进印刷厂即宣布了三决定：1，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2，清理报社人员。3，出不了报以后再研究。报社的三个门全站上了枪上刺刀的士兵，许进不许出。报社内部的保守派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造反派怒不可遏，纷纷上前质问：“为什么军管？”“奉谁的命令？”高碧答复：“我们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

六个小时之后，军区的命令作废，军队全部撤离，“军事占领”昙花一现。其来去匆匆的背后藏着许多内幕和玄机。

是日晚六时许，从现场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的头头，到军区求援，晚十一时黄厚副司令员接见。这些残兵败将向亲人解放军大诉其苦：我们“人员被打、宣传车被砸，还落了个破坏生产的名义”，要求“黄副司令员一定给我们撑腰。”军区党委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高碧来到报社。现场一片混乱，“调查清楚”根本不可能，“革命左派”又无任何外在的标志，这位副部长决定“先斩后奏”——“把部队都带进了报社”。1月23日6时，造反派把军区副政委刘昌请到报社辩论。刘昌再三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并立即下令撤兵。

对于造反派来说，“1·22事件”是军区支持保守派的证据。对于军区来说，这件事成了他们介入地方，卷入派性的契机。由此引发的两派冲突和军民对抗事件接踵而来。

兵撤了，刘昌却被造反派围住辩论。23日上午10时左右，保守派渐渐增多。为“安全”起见，造反派将刘昌带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会议室。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和清华“井冈山”的代表把刘昌围在中央，要他承认三个结论：1、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没保护。2、军区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3、错误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昌此时又累又饿，口干舌燥，不得不承认：“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于是造反派决定：1、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2、责令军区负责人24日下午2时到报社做检查。

23日晚，参谋长王良太主动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做检查，但是他的诚恳检查得到的却是“狡猾抵赖，企图蒙混过关”的评价。军区的头头们终于领悟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检查——批斗——再检查——再批斗，直至搞臭、打倒；要么停止检查，以观其变。

24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黄厚、王良太、刘昌等人统一了认识，做出两项决定：1、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2、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方面拒绝了造反派24日下午2时到报社做检查的要求。

造反派围攻军区

在报社白等了一下午的造反派被激怒了，他们一面派人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面调集人马到内蒙古军区找刘昌算账。

1月25日上午，造反派的宣传车到军区南门外宣传，军区用高音喇叭干扰。不一会儿，军区来人请造反派的广播员和两个贴大字报的学生到军区礼堂辩论。在那里，三个人被

推搡、辱骂、倒剪双臂照相。保守派在外面乘机围攻造反派的宣传车。

各路造反派闻讯赶来，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东纵”到了军区西门，内蒙古工学院的“井冈山”到了军区北门。

师院“东纵”被拦阻门外，工学院“井冈山”的39名战士则列队跑步闯进军区。院内严阵以待的二百余士兵立即将其团团围住，双方展开语录大战。军区文工团中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加入“井冈山”的队伍为其助威……。双方都声嘶力竭之后，终于达成协议——“派代表解决问题”。双方代表来到军区小礼堂，展开辩论。这时西门外的“东纵”也冲进军区与“井冈山”会师。士兵也增加了一、二百人。尽管刘昌出面接见，辩论仍变成对骂。子夜，造反派留下33名代表坚守阵地，其余撤离。坚守者身陷重围，在紧张、亢奋、饥寒交迫之中更加思念伟大领袖。一个女学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歌声马上响成一片，它低沉、悲壮，伴着泪水，伴着呜咽。

1月26日天明，辩论重新开始。

27日上午，军区文工团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成员王建萍、韩文达挤进礼堂，向学生们表示慰问，遭到军人们的辱骂、围攻。学生们组成人墙将王、韩保护起来。俄顷，军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步入礼堂，宣布：“决定给王建萍以行政看守处分。”军人们一拥而上，将这位勇敢的女性从人墙中揪了出来，随后投入监牢。王建萍是被军区关押的第一个军人，是第一个被处分的军内造反派。

31日凌晨，工学院造反派二百余人在军区招待所与军人辩论，指责军人殴打造反派。军区派出六辆卡车，满载军人前往助战。同日，哈军工、上海二医大赴内蒙古点火的造反派被军人围打。

此后的几天，军区党委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批清洗“吃里扒外”的内部造反派。2月1日至3日，“红色造反团”办公室、宿舍三次被砸，造反派被打，重伤四人。造反团当即举行集会，向闻风而至的各路造反派公布军区“罪状”。军区派人包围了会场，造反派急忙转移，突围之中许多人遭到殴打，一些人被捕，跑出去的人或转入地下伺机而动，或逃往北京向党中央求救。军区方面则将其同情者和亲属严密监视。一夜之间，内部的反叛者被扫荡干净。

再说区党委方面，党委一班人此时一面应付日常工作，一面随时准备被对立面揪斗。报社事发，区党委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李质打电话给军区，要求军区采取主动，揪出根子。不久，李质、高锦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又到军区调解。但军区方面认为，他们是压迫军区支持呼三司，是想利用造反派夺军区的权，随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

——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

——作战部增派两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军区院内设三道岗：门口、花池、楼门各一道。

——调集4931、4925、4754等部队的五个连向呼和浩特市秘密集结。

——动用驻呼部队中的五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铁局大楼、电力厂、党委等）。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造反派们在这“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当然不会袖手旁观。“1·22报社事件”甫毕，其造反组织“长缨战斗队”即以《内蒙古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镇压革命群众》为题，写成文章报到中央文革。1月27日此文载入《中央文革快报》，并由林彪批转，通报各大军区。此举对内蒙古军区不啻当头一棒。见到《快报》之后，军区即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会议认为：“《快报》没有以中央名义发，中央不了解

情况，毛主席听了一面之辞，咱们不管它。”会后，军区党委回电中央军委：“对有关情况有不同意见，即将派人详细汇报。”

两天后，军区领导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不得罪中央文革，检讨一下为妙。于是再次致电军委，大意是：“（报社出兵）组织不严、不细，对善后工作的安排认识不足，后果不好，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快报》发出的第三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带着各种材料赴京。这些材料指出：“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高锦明、权星垣（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质等乌兰夫黑帮，维护资反路线，其队伍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队伍纯洁，服从领导，人数众多，深得人心，是革命左派组织。

如果说1月27日的《中央文革快报》使内蒙古军区领导大为伤心，那么第二天发来的《军委八条》则令其大受鼓舞。《八条》由林彪口授，充满了“不许”、“不准”、“不得”一类的否定式规定。其中第一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五条“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使军区领导尤为欣慰。

造反派见无法取胜，遂大举哀兵。

2月2日晚九时，工学院《东方红》、《红旗》60人开始绝食，绝食指挥部向军区宣布了七项要求，大意是：刘昌当众检查，承认错误，支持革命派；答应呼三司、上海二医大等一切革命组织的要求；保护军区内部的造反派，恢复其自由；严肃处理污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和打人凶手……

绝食一宣布，立即得到各造反组织的支持和响应。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内蒙古体委、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内蒙古交通学校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加入绝食队伍，原来的60人迅速增加到139人，其中22人是女性。一百多个单位纷纷来到绝食现场——军区招待所慰问，医院派大夫照料处理，记者呼吁军区重视学生的要求。北京、上海的造反组织驰电声援……

军区戒急用忍，以不变应万变，不为绝食所动。

2月4日晚六时，在静坐64小时之后，各造反派组织组成“见刘昌百人代表团”要见刘昌，限十分钟答复。军区不理。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二十多米，两侧即冲出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采取两三个围打一人的手段，把代表们推倒，拳打脚踢，有的抓住女同志的头发，硬往地上拖；有的夺过代表团的旗杆子打人，有的用皮带抽人，有的用枪托猛击被打倒的同志，有的抓起被打倒同志的手脚往大门外扔。”“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等斥骂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交织在一起。

“这天夜里，架着机枪的三轮摩托车在街上来回奔跑”，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响到天明，保守派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武装部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门口已站上了武装军人。刺刀在路灯、车灯的照耀下闪着幽冷的光。内蒙古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二·五韩桐事件”

2月5日，数百名呼三司、河西公司“8.18”的造反派聚集在军区南门外，围观者上千。军区里一片沉寂，堵在门口的两辆军用卡车已经撤离，门口站岗的卫兵也无影无踪。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在楼前的临时工事里，只有主楼顶上的机枪手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咳。这不祥的沉寂引起了河西公司“8.18”的警惕，他们大都当过兵，经验告诉他们，今天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为了保护呼三司的安全，他们从静坐队伍的后面，悄悄往前面移动。

中午 12 时许，一名军官从楼里走出，左手拿着大衣，右手插在裤兜里。他径直走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青年学生喝道：

“不许胡喊，这是军区！”

青年：“就喊！”

军官：“再喊，就毙了你！”

青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砰！砰！”两声枪响，青年应声倒地，鲜血从胸前汨汨涌出。门外顿时乱成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小将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

主楼里，“准备战斗”的命令沿着楼梯往下传递，埋伏在军区内的人民子弟兵精神一振，枪上膛、刀出鞘，摩拳擦掌准备收拾这帮不知死活的学生。楼顶上，黑洞洞的机枪口对准了南门外。开枪的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若无其事地走进主楼。

南门外，河西公司的造反派拉起手来，一齐后退，拦住向前涌动的人群，同时向人们高喊：“决不能跨进军区一步，千万别上当！”愤怒的人们止住脚步，军区主楼里传出一阵沮丧的咒骂声。

三个小时后，那位被子弹打穿肺动脉的青年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因失血过多死亡。开枪杀人者柳青，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这是文革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学生开的第一枪。

柳青开枪确是军区的阴谋。事后，看守“呼三司”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军区副司令黄厚悔恨交集：“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决心就下了，就可以把他们一下子干掉，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了。”

惊动了北京

内蒙古军区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

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 3—5 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 2 月 6 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

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报全文转载，外蒙古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国际影响让周恩来后悔不迭——电报的最后一段是他加上去的。

2 月 10 日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一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询问了年龄、成分、民族、身份、派别之后，周恩来马上进入正题：谁开的枪？军区和呼三司各持一端，军区矢口否认，呼三司咬住不放。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长曾山带上秘书、法医赴呼调查。随后，周恩来问询了各派的情况，批评了呼三司丑化解放军。最后，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决定各方增派代表来京。接见进行了两个小时。

2 月 16 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四方代表，主要内容是解决如何对待解放军的问题。一方面，他极力赞扬大民主、夺权、红卫兵等一系列创举；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强调秩序和

听话——依靠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他一再强调解放军是发动文革、支持左派的保证，但又肯定造反派是左派，军队中可能有坏人。为了平息事态，他表面上说“事情闹成这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实际上却批评呼三司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维护国家利益。骄狂的呼三司挨了批，个个伏首贴耳。军区方面不禁扬眉吐气。会上，周恩来做出四点指示：规定从2月18日零时起（一）停止对骂，大小报纸停印几天。对骂的传单、标语一律不准再出。（二）停止对打。（三）停止抓人。（四）不开群众大会，不搞示威游行（包括武装游行）。

3月9日，周恩来又分别接见了呼三司和“红卫军”的代表，了解情况，调解关系。

总的看来，在3月18日之前，中央的意思是先平息事态，然后批评造反派不顾大局，给军区一个台阶，给保守派一个机会。进而帮助军区“转弯子”、“调屁股”，承认支左犯了错误，转而支持造反派。同时，压住保守派，让他们归顺呼三司。

无法平息的事态

然而，中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内蒙古军区非但不“拾阶而下”反而“更上一层楼”。保守派则固执己见，毫不退让。这两家结合起来，依仗人多势众，有权有枪，开始狂打和全面夺权。

呼和浩特市 2月9日，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余名“8·18”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70余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当天，王良太指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60多辆卡车，满载武装士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游行示威。”此后，这种游行成了家常便饭。

2月下旬的一天，军区派出三个武装连包围了内蒙古工学院，一名“受蒙蔽的战士”事后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一个排兵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由四辆摩托车开路，冲进了工学院的前楼。不一会儿，他们把四名‘现行反革命’——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派’的革命造反战士。凶狠地押了出来。”“就从这天起，在反党集团的指挥下，我们连续三个夜晚去围攻了工学院。每次去后，我们就绕着工学院跑步，放炸药包，喊‘冲啊、杀啊’，制造恐怖气氛，吓唬革命师生。”

3月初到3月中，保守派和军区紧密配合，出动几万人包围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大楼。断电、断水、断粮，企图逼迫躲在楼里的造反派投降。造反派在楼里筑起工事，准备决一死战。

2至3月间，“只铁路局机关的集中营就关押了400多人”，30多名女性被搜身。呼市公安局和内蒙古公安厅自2月8日至3月17日，拘留、逮捕500多人。毒打、传讯无数。

3月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权星垣、康修民、雷代夫被保守派组织“红卫军”从师院家属院的锅炉房里“抓获”，押送军区，受到军人的围打。后怕造反派劫走，将他们押解到某师驻地。

3月初，军区抓人抓红了眼，竟然抓到了中央文革的头上一——《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两名记者被抓去关了一个多月。“甚至中央打电报叫释放，他们迟迟不肯放，最后还派人押送北京，把记者的笔记本拿到代表团压了一个多月才交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18日周恩来“不许抓人”等“四点指示”下达后，呼市地区逮捕了600多人，刑讯、殴打了数万之众。抓人者上至军区司令部，下至小小的战斗队，被打的上至自治区党委大员下至孕妇、儿童。打人的刑法有浇开水、“坐飞机”、铁丝穿鼻、过电等，至于用鞭子、皮带抽、用枪托打已经稀松平常，不值一提。

各盟市、军分区及外省市 2月初，内蒙古军区向下属各军分区和内蒙古的各地驻军下达《关于反击呼三司及其所属组织的指示》。从此，各军分区大力配合当地的保守派

搜捕造反派。2月中至3月初的十几天中，哲盟、巴盟、锡盟、呼盟、包头、集宁、临河等地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抓人、打人的事件。至3月中，狂抓滥打之风已普及到旗县乃至公社。

内蒙古军区2月3日围捕内部造反派的事件发生后，大多数军内造反派逃往外地。2月中旬，军区下达《通缉令》并派出多路武装军人到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抓这些“吃里扒外”（黄厚语）的叛徒。黄厚的指示是“抓人要快，统统抓，见到就抓。”

2月26日，军区管理局局长刘钧夫妇在西单商场门口被一队武装士兵抓获，押解回呼。

3月1日，躲藏在北京政法学院里的16名“红色造反团”成员被捕。王良太指示，这些人下火车后，由一个排的兵力武装押解，徒步“绕道粮站街并经过军区院内押往看守所。”“在军区大院，将造反派的同志在大礼堂前面台阶上示众。在零下一、二十度严寒中冻了近三小时，均遭残酷的毒打。”

北京召开四方会议，在内蒙古军区看来，正是夺权的天赐良机。“等他们回来了，权已夺完了。”保守派随之而动。2月5日之后，呼铁局、邮电局、广播电台、公安局等重要部门率先被夺了权。2月12日“晨四时，‘红卫军’、‘工农兵’并有两个连全副武装的军队（后增到六个连）在X X指挥下，纠集近万人，在内蒙古日报社实施反夺权。”

一周后，军区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张德贵任主任，下设宣传、调研、夺权等五个组。如果说这个办公室是夺权的总策划，那么，军区向全区机关、企业、学校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则是夺权的编剧和导演。从2月初到3月中旬，全区旗县以上的190多个单位被保守派夺了权。

这种夺权往往采用人海战术，如遇抵抗则破门窗而入，大打出手，大抓一批，然后派人到军区报喜。打人者多是从工厂、农村调来的闲杂人等，这些人以夺权为职业，白天睡觉，晚上行动。老百姓为此编了四句顺口溜：“白天睡觉晚上闹，打人不分老和少，只要到时给工资，生产工作都不尿。”（“尿”是内蒙古的方言，“不尿”即不管，不理睬。）

一派掌权就意味着另一派遭殃，用军区领导的话讲，“夺权配合镇反”。有军区做后台，保守派稳操胜券，造反派一败涂地。河西公司“8·18”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内蒙古党委红旗总部被砸，呼三司的老巢内蒙师院“东纵”大楼危乎殆哉。一个保守派头头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我们对他们就是要镇压……打几个人没关系。呼市四十万人，按百分之一的反革命算也得抓四千人，现在抓得还不算多。”

在大搞夺权的同时，军区着手筹建党委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与高锦明等“反乌兰夫派”对立的王逸伦、王铎被军区列入应予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名单之中。在以二王为首的“革命干部”的支持下，军区决定于3月18日召开全市大会，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

以军区为首的保守势力之所以敢于如此大胆地自行其是，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以往的经验教训使之坚信，这场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工农兵。到了3月底，王良太还信心十足地向部下打保票：“支持‘无产者’大方向是不会错的，中央不可能只要二、三万人的呼三司，而不要十几万人的‘工农兵’。”

第二，他们误解了中央的意图。3月18日以前，中央对内蒙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这一情况使内蒙古军区错误地认为，中央是支持军区的。“相信中央和总理不会和稀泥”是军区领导的共同心理。3月初，黄厚等人揣摸中央意图时想起了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你们夺权，中央还要考验考验嘛！”黄厚等人由此确信：“总理这么长时间不接见我们，就是要考验我们能不能夺权，中央用拖的办法，把呼三司拖垮，等他们回去权也夺完了。”

中央宣布“红八条”

事实恰恰相反，中央大为震怒。从3月18日至4月12日，中央多次接见四方代表，严厉批评内蒙古军区、自治区党委的王铎、王逸伦和保守派。

3月18日，中央斥责内蒙古军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向中央示威”，“欺骗中央”，“反抗中央”（周恩来语）。“完全目无中央”，“眼里没有主席”，“把部队拿出来对付群众”（康生语）。“扣押记者，胆大妄为”（关锋语）。“搞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萧华语）。“炮轰中央文革”（王力语）。周恩来指出内蒙古军区反中央的八条证据，其中包括上述抓人、打人、围攻“东纵”、弄虚作假、擅自夺权、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等。康生表扬呼三司“不敢反中央”。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派出以军委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内蒙古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为正副团长的中央调查团赴呼，为师院“东纵”解围。

3月30日，中央召见区党委代表，周恩来让二王检查错误。但二王为自己分辩，于是遭到了接见者的一致斥责。江青说王逸伦“装糊涂”，“很嚣张，不尊重康老”（因他没称康生为康老，而称其为同志）。康生说他是“乌兰夫的暗藏分子”，“支持‘无产者’是有血缘关系”（因为王逸伦的儿子与“无产者”有来往）。周恩来说他“顽固地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王铎则被中央视为“搞投机”，“同保守派搞结合”（周恩来语）。中央最后对二王下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周恩来语），“是没落的、死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康生语），“是法西斯统治”（王力语）。康生还拿出他的看家宝，追问王逸伦是怎么混进党内的。这时，王逸伦距离特务、叛徒只有咫尺之遥了。

4月6日，中央听取造反派对军区和保守派的揭发，诸首长继续指斥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这次接见造反派代表58人，“红卫军”仅9人，倾向性一目了然。

4月12日，中央了解被害者的情况，指斥保守派抗拒中央四点指示。造反派揭露保守派贴了“打倒康生”的“反动标语”，举着刘少奇像游行等“罪行”。会上，周恩来宣布：由北京军区派出部队，军事接管呼铁局，将打伤者送进医院。众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几次一边倒的接见，极大地打击了内蒙军区、自治区党委二王和保守派。他们原来设想的最坏结果——“各打五十大板”也化为泡影。更让军区领导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死保的王逸伦一夜之间竟成了特嫌。此时，二王成了过街老鼠，无暇自保，保守派气愤难平却无力回天。军区则百般无奈，只能放人、道歉，表示愿与呼三司大联合。

4月13日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萧华、王力等人第八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至此，大局已定。王铎交上的“请罪书”成了“投机家的自供状”。王逸伦已被定为特务、叛徒逮捕送监。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必须改弦更张。这次接见会上，周恩来宣布了中央关于解决内蒙问题的决定，其要点如下：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自2月5日以来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支持了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派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仍任军区政委。刘贤权去内蒙之前，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由滕海清、吴涛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的领导班子。

——成立以滕、吴为首的内蒙革委会筹备小组。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人参加小组工作。

——乌兰夫的问题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隔离反省，王铎停职检查。

至此，由中央召集的四方会议费时70天，接见八次共27小时，最长的一次用了5小时40分钟。代表们由最初的20人增至二百多人。接见者由周恩来、萧华二人增至包括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各大军区负责人在内的几十个人。它的结果是产生了被造反派视为护身符的“红八条”——《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4月13日从此成为内蒙古造反派的重要纪念日，它标志着造反派的胜利和保守派的失败，标志“革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全力对付北京”

第二次接见内蒙古的代表时，周恩来发过一番感慨：“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红八条”下达后内蒙古军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北京，有时候，解放军比红卫兵更难对付。从4月中到6月中的两个月时间里，内蒙古军区和保守派进行了以“全力对付北京”为宗旨的大规模的反抗。

4月14日“红八条”传到呼市，“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与中央血战到底”、“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立即出现在青城的大街小巷。下午4时，“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保守组织的骨干在工人文化馆召开“誓师大会”。会议声明：即使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干到底。会议决定：1、决不解散。2、赴京告状。3、就地示威。当晚，二百余人拦车赴京。第一批告状的人在北京东大桥接待站建立起上访告状指挥部。此后，内蒙古赴京告状的人们蜂拥而至。工、农、学生、军人，各行各业；误点、殴斗、拦车，无日无之。

4月18日上午，华北地区晴空万里。呼市、包头、临河、赤峰、海拉尔等城市上空出现了军用飞机，飞机过处，雪花一般的传单纷纷扬扬，徐徐飘落。这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致内蒙古各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的信。信中说：“1、‘红八条’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2、不要受坏人挑动和蒙蔽。3、不准继续赴京，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保守派对此嗤之以鼻，不但拦车赴京的人有增无已，而且在北京越闹越凶。他们到华北局索要纸张、笔墨、宣传材料和汽油，不给就大骂“饭桶”、“官老爷”；华北局办公厅副主任赵瑾卿成了人质，从华北局押到中南海，又从中南海解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4月21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五百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恩来不接见，我们不离开。”与这些人同时出现的是三条大标语：“毛主席啊，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民想念您！”“强烈要求重审内蒙问题！”“强烈要求周总理接见，反映内蒙情况！”一张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锦明六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在标语的一侧。北京的四月天气，春意盎然，夜晚纵偶有风寒，久经严寒锤炼的内蒙人也根本不在乎。静坐持续了六天六夜，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还是头一次。”

4月27日，静坐以中央让步而告终。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很快就成了“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了他们。接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内蒙保守派三千多人，呼三司几十人参加接见。还有为了维持秩序的北京“红代会”数千人。大会先由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军区主要领导——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做检讨，刘华香在检讨中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今后一定“帮助革命组织

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随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宣讲“红八条”，劝保守派听话。会场上反应异常强烈——在周恩来不足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达五十余次。“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请听我讲”，有几次周恩来一连喊十来个“同志们”，会场仍骚乱不已。康生怒斥：“不要捣乱！”“不愿听的滚出去！”自文革以来，中央开这种乱会还是头一次，当然，它远不是最后一次。

滕海清是4月18日抵达呼市的，如果知道来内蒙古的下场，这位中将司令员是绝不敢踏上这块土地的。

在他来之前，内蒙古已经成了一个点燃的弹药库。“红八条”还未正式传达，造反派就被打伤了十多人。呼市街头还布满了保守派杜撰的周恩来“三点指示”、“四点指示”。广播车告诉人民：周总理发出指示——“八条是假的，已夺权的单位保持不动，个别错了的要纠正。”“对群众组织不能解散、不能取缔，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红八条”下达后，上万名保守派举行昼夜游行，军区战士数千人戴着“红色工人”、“红色战士”、“无产者”的袖章，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滕海清、吴涛从军区赶出去”的口号，大搞武装游行。

军人们说到做到，偌大一个内蒙古军区，竟没有滕代司令员、吴涛政委的立足之处。此二公不得不在新城宾馆下榻。

4月19日晚11时，几十辆满载“无产者”、“红卫军”的汽车包围了新城宾馆，北京军区驻宾馆的战士被打，人们高喊着“找滕海清、高锦明算账”的口号冲进宾馆，内蒙党委办公厅秘书张鲁被当作高锦明的秘书饱尝老拳，滕海清在造反派的保护下，急急从后门逃出，逃到由北京部队接管的呼铁局。

第二天，又有六、七百人冲进宾馆搜寻滕、吴、高。风闻高锦明躲进了呼市公安局，这些人马上将公安局包围起来。有人提着手枪寻找高锦明。

第三天，围攻者转向省公安厅，又包围了呼铁局，如果不是北京军管部队的拼死保护，这两位汉、蒙将军今后的亲密合作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天后，滕海清在军区做报告时，遭到军人的围攻、辱骂，滕的高血压复发，住进了253医院。

这期间，呼市街上，反中央的大字报更上一层楼，很多大字报众口一辞：“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公安厅贴出了《十三个想不通》，财贸“北斗星”质问中央《十五个为什么？》，军区“人民子弟兵”要求中央回答《二十一个为什么？》，“红铁战士”提醒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想一想，为什么《八条》下达后，广大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痛哭流涕，而被红卫兵查抄的地、富、反、坏、右全家吃饺子？”中山东路的墙上贴出《给滕代司令员的一封信》，信中责问滕海清：“你是呼三司的司令员，还是内蒙军区的司令员？”

大字报贴的再多也只是宣传，打、砸、抢才是理论联系实际。4月中下旬，武斗之风迅速蔓延。百什户的农民乘六辆汽车进城，专程袭击土默特小学，因小学生前一天向他们扔草棍而大打出手。首都红代会赴呼宣传队在军区北大门外遭到三百余人的围攻，司机被打昏，数十人受伤……工交瘫痪，纲纪废弛。烟厂锅炉房工人因派性斗气，擅离职守，致使锅炉烧坏。“军区大院乱得像市场一样”（周恩来语），平民百姓出入如履闹市。军官、战士赴京离呼，持枪游行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军区政委吴涛在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披露了当时内蒙部队的“盛况”：“4951部队，中央决定下达之后，一个武装连上街游行，对抗中央，这是我军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事件。总政检查组检查他们的工作，他们竟敢撕毁检查组的材料、摔缸子。在紧要关头，军区调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拒绝执行，按兵不动。他们的政委在北京，我们叫他回来，他不回来。看，他们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军

纪国法，问题是多么严重啊！4931部队有一半的人出来，散兵游勇，上街游行，背叛中央。4754部队某连有些战士，跑到北京组织地下连队，一个副排长任连长，一个卫生员任指导员，下设勤务组、宣传组、工厂组、农村组，组织得很严密。好像现在是天下大乱，到了‘司令赛牛毛’的时候了，拉出一股部队，他就是司令。一个连有时集中过七十多个女的，站岗还有女的陪同。”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4月20日军区发布两条命令：一、禁止上街游行，控制车辆，如有违反，按破坏军纪论处。二、干部要旗帜鲜明，不得接见保守组织代表，不准向他们招手。4月28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六点指示，正告内蒙古军区必须坚决执行贯彻“红八条”，“对抗中央是绝对不允许的”，“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如此，武斗仍在不断升级。

进入五月份，两派武斗推向高潮。5月10日晨，保守派砸了外贸局土产公司，抢走了两汽车锹把。下午两点，在赛马场开会。此会的目的是全市总动员，抓高锦明、砸红旗总部、占领党委大楼。会后，几千名保守派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先砸财经学校，再冲党委大楼。一楼很快被占领，但通往二楼的三个楼梯都被造反派用木板钉死，易守难攻。攻方成立敢死队，以大锤、铁镐为武器，猛砸木板，不成；又以毛主席语录牌为掩护，用铁钩、绳索拽开木板。守方见状，砖石齐下，攻方改为水攻，又不成，旋即放火烧楼。同时，架起长梯向守方的背后——二楼阳台发起强攻。攻方火攻了四次都被扑灭，阳台战斗亦失利。无奈，只得把矛头转向食堂——米、面、油、糖、肉被抢劫一空。医务室亦被扫荡，席卷药品、器械而去。同时断电断水、抢砸汽车……。呼三司、“8·18”、“火车头”等造反派赶来增援，在党委大院内外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央得讯，驰电慰问造反派，指令北京军区派兵救援。造反派和解放军“并肩战斗”，经过一夜激战，攻方终于败北、总指挥曹文生、副总指挥张三林等头目被捕。党委大楼一片狼藉，机要文件，档案全部被抢走，墙上还留着保守派的恨恨之言：“滕海清从内蒙滚出去”，“油炸高锦明”，“打倒红八条”！此役双方伤者无数。

根据当时内蒙古的各类小报公布的数字，自4月13日至5月13日的一个月内，呼市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十万人次，出动汽车七百余辆，参加武斗三万余人。有三千多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造反派方面上街游行的不多，出动车辆也大大少于保守派，因为他们正忙于落实“红八条”——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王铎、刘景平、周吉、沈新发、张鹏图、赵会山等人身上，大开特开批斗大会。但其“被迫反击”、“英勇自卫”的人数也并不少于挑起武斗的保守派。

在这一个月中，因武斗致伤者一千三百余人，重伤三百人，致死者十余人，如师院学生：欧阳儒忱、许克灯、罗德营、王林洪、林振山等；华建工人：姚绍宝；解放军战士：绍德胜等。

在内蒙古的文革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性暴力潮和两次局面失控，第一次发生在1967年2至6月间，即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前后这段时间里。

回光返照

内蒙古的局势引起了北京的极大关注。5月10日保守派火烧党委大楼，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等候内蒙的消息，一直坐到天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说的不错，“事情闹大了，总有人管。”在北京上访、呼市武斗的两面夹击下，中央再也坐不住了。

5月16日上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三方面给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开个会，劝他们回去照八条办事。当天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

、叶群等16位中央首长在大人大会堂接见了两千七百余名赴京战士。接见之前，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召集军区各方面的领导开会，研究了对付中央接见的三个方案：如果是多方面接见，就呼口号，退出会场。如果单方面接见，就向中央施加压力。如果主席接见就控诉呼三司。王良太另外还有三条指示：1、如有首都院校的人在场，就退出接见。2、如果吴涛参加接见，就把他撵出去。3、向中央递材料，说明真相。因为这次接见是单方面的，所以军区方面按第二方案进行。

周恩来一进会场，会场上一片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在台上解释八条决定，台下则以“打倒高锦明”“打倒吴涛”等口号回答。江青先用好话哄：“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继而来硬的：“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无奈下面的人软硬不吃，会场更加混乱，情绪更加“沸腾”。聂荣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抬出林副统帅的金科玉律吓唬人：“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可是这些无法无天的内蒙军人不但不理解的不执行，就连理解的也不执行了——不管台上如何强调内蒙古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如何解释毛主席工作多么繁忙，台下的两千多条喉咙仍一个声音地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恩来苦口婆心：“你们没有责任，是无罪的。”江青好言相劝：“你们没有责任，中央不责怪你们。”叶群随声附和：“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可惜，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怒的海洋之中。终此会，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第二夫人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这次大会，除了得到了一大堆告呼三司、告高锦明、告吴涛的状子之外，中央什么也没有得到。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

5月19日凌晨，周恩来、萧华在大人大会堂接见军区警卫营，委婉地告诉他们，要准备集中整训。会议指定73名代表参加。结果挤进去100多人，周恩来嘱咐他们要听中央的话，服从滕、吴领导。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不少与会者摩拳擦掌要抓吴涛。

5月21日晚，周恩来、康生、徐向前、萧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等人召见军区领导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滕海清、吴涛、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10人。这次召见一是重申中央八条不能改变，中央坚决支持滕、吴和造反派。二是命令军区的七个领导一齐说话，第二天就把赴京人员带回。“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三是命令军区宣布几条命令，把部队管起来，保证滕、吴的正常工作，四是正告军区某些领导，军区大批人来京闹事，在5月16日大会上高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这不是大多数的问題，而是有个别坏人在背后挑动。

早在三月份接见内蒙四方代表时，周恩来就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这个总理说话也不算数了。”上述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调拨专列运送内蒙军人回呼和浩特和浩特的计划落空。会后第二天，二十余名赴京军人乘卡车冲进北京京西宾馆抓捕吴涛。幸亏吴涛不在，躲过一劫。第三天（5月24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召开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大会。千余军人在会场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号，数百人冲上主席台，抢麦克风，向中央提出以修改八条决定为主要内容的五条要求，并强令吴涛签字。吴不签，战士们拳脚交加将他们的中将政委打翻在地，痛殴半小时之久。总政办公厅主任陆扬和几十名警卫、工作人员也被打。会场成了战场，军人成了暴徒。酣战将歇之际，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的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王良太回到住处后洋洋自得，并喝了茅台酒。”

收场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书写内蒙古的历史——5月25日，上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垂询了内蒙古的事态。同时，经毛泽东和军委批准，内蒙古军区滕海清代司令员、吴涛政委发布五条命令，要点是：外出串联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之前返回，过期不归者，以自由离队处理。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不开展“四大”，不许有战斗组织，不许游行、集会。教育批评不满中央八条者，对抗者给予纪律处分。反对打、砸、抢、抓。支持呼三司等左派组织。同日，中央全部收回发给军人的返程车票。

5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它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晚，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传达了军委的上述决定，表扬他们听话，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立新功。

十五天后（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将中央对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及其部属的处理公之于众。至此，“全力对付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

乘着“北京的东风”，呼市造反派在北京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助下，于五月底攻克保守派在呼市的最后堡垒——内蒙古工会大楼。一度拥有百万之众的保守派终于土崩瓦解。头头被捕，群众分化。经过一阵倒戈、揭发、相互攻讦、翻然悔悟的整顿之后，这些为党、为革命、为红色江山、为心中的红太阳英勇奋斗的人们，有的失去了政治热情，有的找到了新的契机，有的怀抱着满腔悲愤，伺机东山再起。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内蒙古军区的当事者尝到了专政的滋味，如果他们知道全国十三个大军区中有九个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他们一定会大感宽慰的。如果他们知道，此时被中央视为“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滕海清、吴涛、高锦明等人，两年后就成了“清队扩大化”的罪魁祸首，成为内蒙人唾骂的“挖肃”元凶，他们一定会庆幸今天得到的处置。作为内蒙古三大冤案之一——“内蒙古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十年后他们得到了平反昭雪，成为抵制极左路线的英雄。这些“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否认识到，作为军队暴力活动的策划者和责任人，他们与滕、吴、高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那些为了共同的使命而互相厮杀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们是否认识到，他们都是伟大领袖实现政治意图的工具。“狡兔死，走狗烹”，谁也逃不过被“烹”的命运。

随着滕海清、吴涛、高锦明等人的上台，内蒙古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千三百万各族民众等待着各革委会的建立，等待着斗、批、改阶段的到来。

作者简介：

吴迪(启之)，1951年出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1968年下乡内蒙，1971年进内蒙古铸锻厂当混沙工，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1987年任北京电影学院教师，1998年受聘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著作：《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西风马牛》、《被改造的艺术：“人民电影”的兴衰》(1949—1966)。译著：《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与人合译)、《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八月》。编《中国电影

研究资料》三册。